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近年來，「全球南方」話語急遽崛起，成為中國在很多國際外交場合發言時的關鍵詞。「全球南方」具體指涉為何？與學術界有關「南部理論」的探討有何關係？從「發展中國家」到「全球南方」，反映中國的外交戰略有何改變？本刊6月號將刊出專輯予以深入剖析。

——編者

智能客服的勞動價值

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中，中國電商平台正在加速推進人工智能(AI)技術在客服領域的應用。這項技術革新如何重構電商客服的工作模式？對客服的勞動價值生產與實現造成何種影響？范璐璐、韓晶瑩的〈中國電商平台客服的人工智能應用研究——基於勞動價值論的分析框架〉(《二十一世紀》2025年2月號)一文，基於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等方法，生動呈現了人工智能技術在電商客服中的實際運用及其局限，揭示了技術變革、勞動異化與資本增值之間的複雜關係。

作者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視角出發，指出客服勞動

已成為電商平台資本增值鏈條中的關鍵節點。客服勞動除促成商品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實現，亦能藉由提高數據量、流量提升資本收益，並為「需求導向生產」模式提供數據與服務支撐。此論斷為解析客服勞動於平台經濟中的價值定位構建了具有啟發性的分析框架。與此同時，作者亦強調「弱人工智能」在替代人工客服時的明顯局限。若平台在客服中過度依賴弱人工智能，實則加重了人工客服的情緒勞動，導致消費者體驗下降，最終不利於勞動價值的創造與實現。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挑戰了「技術至上」的迷思，為我們理解人工智能與客服勞動及其價值生產與實現的動態關係提供了新視角。在此基礎上，未來的研究可深化探討客服勞動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價值轉換機制，影響平台經濟中的資本積累與勞動關係。特別是隨着數據化與平台化不斷深化，客服勞動展現出多層次的勞動特質：除了「服務勞動」，亦透過數據回饋與數字留痕等方式，為平台營運與訓練智能客服提供關鍵的「數字勞動」與「數字原料」。以後的研究可以結合更詳實的實證資料，進一步剖

析這些多元勞動形式在價值生產與實現中的具體機制。

此外，文章主要聚焦於弱人工智能的技術局限與資本邏輯對客服勞動的影響，而對客服群體自身的勞動主體性與行動策略尚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實際上，勞動者或可透過微觀抵抗策略，調整人工智能技術在客服實務中的應用方式，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資本增值機制。因此，未來研究可更加關注客服勞動者的行動策略與談判空間，進一步揭示「資本—勞動—技術」三者之間更為複雜的動態互動。

鄧韻雪 長沙

2025.3.10

雙贏的黨建

很多人曾預言，隨着私營經濟逐漸發展壯大，中國會出現一個獨立的企業家群體及龐大的中產階級。這些人獲得財富後就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利和更多的政治參與，最終中國會逐漸轉型為一個民主國家。如今，民營企業已經在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為何上述猜想未有成真？

馬愛芳和胡泳的研究似乎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的「非正式」監管：以黨建為例〉(《二十一世紀》2025年2月號)一文揭示，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面臨多重監管，除了政府的正式監管外，還有來自中共的「非正式監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黨支部。非公有制企業設

立基層黨組織始於1996年，其後不斷加強。2012年十八大以來，在中央組織部與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的監管下，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進展迅速，黨員數量迅速提高，基層黨組織的權力亦顯著增強。比如，愈來愈多的黨員職工獲得黨組織的推薦，在企業的重要部門任職，藉此實現黨對私營企業的領導。這恐怕就是私營經濟蓬勃發展，卻始終不曾對一黨執政構成實質性挑戰的一個原因。

那麼，私營企業對黨建的態度如何？本文揭示了不同私營企業對黨建的積極性不同。是否參與黨建，既與「經濟重要性」相關，即實力排在中國互聯網100強企業中前幾十位的企業一般都會參加黨建；亦與企業從事的業務有關，比如從事與內容有關的互聯網企業，參與黨建的可能性較高。

對於私營企業來說，黨建固然影響了企業經營的獨立性，亦未嘗不是一個機會。如果私營企業態度積極，將較易獲得黨的信任，經營活動不易受到干擾。一旦企業遇到困難，可能獲得政府的幫助。企業家可因此入黨，被行政吸納，變成「自己人」，獲得一定的政治資本，更有利於企業的經營。反之，如果拒絕黨建，其風險並非企業家所能承受。因此，透過黨建，黨得以將其監管延伸至正式監管無法觸及的領域，有些私營企業藉此獲得黨的支持，達至「雙贏」的效果。

任何成功的監管，都不可能僅靠暴力。有效、持久的監管，一定是基於監管者與被監

管者達成了某種共識，甚至是「利益捆綁」。故中國的政企關係，不同於「小政府、大社會」的西方國家。對中國複雜的國情缺乏了解，恐怕是有些觀察家的預言之所以落空的原因。

毛升 香港
2025.3.12

數據標註產業中的資本、政府與勞工

二十世紀末以來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工廠」，創造了「中國奇蹟」，引發了關於「中國模式」的持久爭論。儘管不同觀點各有側重，但該模式的核心無疑是資本與政府結盟壓抑勞工所形成的「比較優勢」。隨着人口紅利消失、外部市場震盪等不利因素出現，中國經濟亟待尋找新的突破領域。近年來人工智能的急速發展提供了延續經濟奇蹟的可能性，行之已久的「中國模式」能否延伸到該領域成為亟待探討的問題。

吳桐雨、夏冰青的〈科技資本與地方發展的糾葛——以G省T市數據標註基地為例〉（《二十一世紀》2025年2月號）一文以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環節——數據標註產業為研究對象，呈現了前沿科技資本與後發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及其對勞工和地方社區的影響。該文發現，科技資本基於不斷變動的積累邏輯，與地方政府不同時期的政策偏向相結合，塑造了標註基地的發展模式及其對勞工的控制模式。

2020年以前，人工智能處在早期探索性發展階段，科技資本強調數據標註的保密性和高質量。該資本積累邏輯恰與國家「脫貧攻堅」目標相契合，

地方政府以優惠政策吸引科技大廠入駐扶貧社區，形成「人工智能+扶貧」的產業發展模式。該模式下的標註基地大量僱用「媽媽工」，形成管理溫和、家庭友好的勞動控制方式，以產業嵌入社區達成經濟利益與社區穩定的雙贏目標。

2020年以後，人工智能技術急速更新，科技資本轉而強調數據規模與效率。科技大廠迅速擴張標註基地，並利用中樞平台技術推動數據任務快速流轉，形成基地間的「逐底競爭」。彼時又逢國家宣布「脫貧攻堅」勝利，地方政府工作重心隨之轉向追求經濟利益，開始放任甚至支持基地的商業化改革。在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地引入外部管理團隊，替換低效率的「媽媽工」，強化考勤制度、延長工作時間並暗降小時工資，以勞動控制的專制化打造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與社區相脫離的「逐底」基地。

與發達國家主要依靠網絡「眾包」標註數據、依賴「算法冷酷」（algorithmic cruelty）規制數字零工的產業模式相比，中國的數據標註產業表現出鮮明的資本與政府結合以規制勞工的特點。而與傳統產業資本相比，科技資本因快速的技術變遷、激烈的市場競爭不斷轉變積累邏輯，借助平台技術便利、地方政府協助，超越時空限制，從而不斷改變勞動控制模式並加劇商業化脫嵌。顯然，資本與國家結合的「中國模式」成功延展到數據標註產業，並讓該模式具備了新的特點。數據標註產業的發展邏輯能否解釋人工智能的其他領域，亟待後續研究進行探討。

王歐 武漢
2025.3.17